

『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

主编 林其铨

副主编 施炎平

五缘民俗学

郑土有等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

五缘民俗学

郑土有 等著



主编 林其铨

副主编 施炎平

同济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五缘民俗学立足于中国根深蒂固的“缘”文化,从“缘”与“俗”的关系入手,研究在“五缘”基础上生成的诸民俗事象,是五缘文化与民俗学交叉研究的新领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民俗学的初步尝试。

中国人讲究缘分,“缘”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情感认同的标识。“缘”是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俗”是一种生活规则,两个及以上的人生活在一起就需要这种规则,否则就难以和谐相处;从维系“关系”的目的出发,势必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规则”,民俗也因此而产生。反之,人们日常生活中周而复始的“俗”,又不断强化“缘”的关系,呈现为因缘生俗、由俗固缘、俗在缘在的特征。

亲缘民俗、地缘民俗、神缘民俗、业缘民俗、物缘民俗构成了五缘民俗学的基本框架,探讨其发生规律、内涵与特征、表现形态、现实功能等问题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缘民俗学 / 郑土有等著. —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3. 9

(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 / 林其燮主编)

ISBN 978-7-5608-5270-6

I. ①五… II. ①郑…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②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IV. ①K293②K8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7497 号

《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

主 编 林其燮 副主编 施炎平

五缘民俗学

郑土有 等著

责任编辑 季 慧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陈益平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73000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5270-6

定 价 39.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涵的“五缘文化”说,自1989年4月在福建省漳州市“纪念吴本诞辰10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五缘文化与纪念吴本》论文中提出,迄今已有24个春秋了。在众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参与研究和开拓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已公开出版专著、文集九种:《五缘文化论》(林其铨著,1994年)、《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编,1997年)、《五缘文化与市场营销》(林有成著,1997年)、《五缘文化力研究》(吕良弼主编,2002年)、《海峡两岸五缘论》(吕良弼主编,2003年)、《五缘文化概论》(林其铨、吕良弼主编,2003年)、《物缘文化研究》(林建华著,2004年)、《五缘文化:寻根与开拓》(林其铨主编,2010年)、《五缘文化与两岸关系》(王碧秀主编,2010年)。此外,上海社会科学院还编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五缘”研究成果选集》(2010年)。在国内外报刊公开发表的论文、文章,数以千计。在实际应用领域,从最初对外开放的“三引进”(引资、引智、引管理)扩及侨务、两岸关系、社区建设、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经贸网络。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的拓展,也催生五缘文化研究机构和社团的出现:1993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率先成立“五缘文化与华人经济研究室”;1995年12月,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注册成立;1996年11月,福建省五缘文化研究会宣告成立;2009年10月,美国五缘文化协会(Five Yuan Culture Association in USA)在美国加州洛杉矶注册成立。由此可见,五缘文化说跨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阻隔,穿越政治和经济的界限,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缘文化说的提出,是受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改





革开放实践成功经验的启迪和对引进西方管理与实际运行机制的文化环境的思考而产生的。所以,五缘文化研究是从实证性、应用性研究起步,初期侧重实践经验、历史资源的调查,从文化、经济互动的角度考察五缘文化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作用,论证五缘文化生存空间的客观性和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也逐步从经验性、实证性向学理性、本原性的方向深化,从而由外在性的描述向精神内核、元典传承、古今转化、中外沟通等领域探索。五缘文化研究涉及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民俗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哲学等诸多学科,具有边沿学科性质。五缘文化研究吸引了多学科众多学者,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介入,用不同学科的视野观照,因而大大丰富了五缘文化研究的内容。在众多学者经过 20 多年的辛勤耕耘下,五缘文化说已初具学理构架,然而作为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应当说还有很大的理论空间,需要继续丰富、深化和完善。

自由与伦理出自人类自然人和社会人的二重性,人类社会不能没有自由,也不能没有伦理,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自由与伦理的和谐统一。但是,不同的民族各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道路,为应对环境(自然的、社会的)的挑战,选择适于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各民族不同的心理经验积淀和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同样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道路,因而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心理素质和他文化。与西方相比,中华文化在观念上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二是整合系统的思维方式和格物致知同体悟致智相结合的致知途径,以及观物取象、寓意于象、连类比物、切类指事的表达方式;三是以人为本追求有序和谐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些核心理念体现在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上,便是群体本位、伦理中心,从初民的自然人伦进而宗法五伦,再到五缘,发展到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境界,表现形态随历史发展而有变化,但核心理念却稳定贯穿始终。

中华民族以远古的华夏族为骨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像滚



雪球似地吸纳诸多民族参与自然形成了多元一体、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文化代代相传持续了7000余年不曾中断的伟大民族,这是世界2000多个民族中所仅有的。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中多灾多难,遭遇过种种危机,但凭借自身的勇敢和智慧,最终都能战胜灾难、克服危机,得到更加壮大的发展。这证明她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何方,值得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认真思考和求索。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在其名著《艺术哲学》中提出了“精神地质形态”说。他认为精神文化从远古到现代,犹如地质学的积层,由今溯古可以看到:“好比松散的冲积层,完全堆在浮面”;“往下去是青石,云石,一层一层的片形石,非常结实,抵抗力很强”;“再往下去是太古时代的花岗石,埋在地下不知多少深,那是全部结构的支柱,千百年的攻击力量无论如何猛烈,也不能把那个岩层完全去掉”。又说:“每个民族的情形都是如此;只要把历史上的某个时代和它现代的情形比较一下,就可发现尽管有些次要的变化,民族的本质依然如故。这便是原始的花岗石,寿命与民族一样长久”。所以,“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显露的心情与精神本质,在最后子孙身上照样出现”。(《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51、354、355页)。丹纳所说的民族精神地质形态埋在最深层、成为“全部结构的支柱”的“花岗石”,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是产生于人类轴心文明时期(公元前600—1000年)的元典文化,或说是民族的文化元、文化基因,这就是民族文化最具有生命力的源头活水。《易传》中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有人认为其中蕴含的奋斗精神和兼容精神就是中华民族魂,时代再怎么变化,这种精神都具有永恒价值,这大概就是中华文化结构的重要支柱,也就是丹纳所说的埋在民族精神文化最深层的“花岗石”。

民族文化的核心理念在传承中有其稳定性,但她存在的形态不是僵死不变的。民族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变化,犹如穿越时空滚滚向





前汹涌流动的河流，她浸润着经过的两岸大地心田，鲜活地呈现于历史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之中。精英思想、典籍文化正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社会生活的提炼、写照，但不可能囊括全部。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滋润着民族代代成员的心田，积淀为心理素质，成为行动的潜在指南。所以，真正的民族文化源头活水是不会干涸的，它与各个新历史阶段出现的新因素结合，化为富有生机的社会文化活水，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鲜活形态。就社会结构、人际网络发展中的“五缘”形态而言，它既是中华民族“群体本位”、“伦理中心”核心理念的外化，但又与时俱进，从原生封闭型到次生过渡型，再到再生融合型的发展过程，因而我们不能用僵化的眼光看待它。五缘文化是基于人性即社会性和民族性自然形成的“王道”文化，而不是依靠强力而形成的“霸道”文化。社会资源潜藏于社会人际网络之中，五缘文化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对人群起凝聚、调谐、纽带、桥梁作用，形成社会人际网络。因而五缘文化具有理论和实际应用的双重品格。在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中，只要摆正法、理、情的位置，同公权力加以区隔，五缘文化便能发挥其潜在的无穷正能量，描绘出构建和谐社区、和谐社会的路线图，成为实现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软实力的一种形式。

五缘文化研究可以有两条进路：一是从历史典籍中找出源头活水，追源溯流、因枝振叶，撷取精华，探讨现实意义；二是从现实生活中发现活水，再找活水源头，观澜溯流、振叶寻根，探索今古文化链接根据。《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可谓两路并进，既沿波讨源追寻五缘文化的文化根、心理源；又由隐及显，探索五缘文化在民俗、社团等载体的存在形式，及其现代功能与作用；诸因素的综合，由微观到宏观，最终转化成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软实力。本丛书由此两重进路推进五缘文化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是初衷，而其宗旨是基于中西比较考察的背景，突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论题，力求通过学理性、时代性、实践性相结合的探索和研究，深化五缘文化的理论内涵和思想意蕴，拓展其实际应用的广度和效应，使五缘文化的推广和弘扬，成为促进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资源，融入



现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要素；进而探讨五缘文化的未来发展，并阐释其对跨文化沟通和全球文化建设的价值和功能。

丛书五册，分别于不同角度和侧重点展开。丛书各册的中心内容是：

第一册《五缘文化与中华精神》(施炎平)，着眼于人际缘分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层面，梳理和概括出中华文化的“五”型思维模式，来探索五缘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思想流变，进而考察和总结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价值体系，以为现代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资源。

第二册《五缘文化心理研究》(蒋杰)，应用现代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结合深层的文化分析与比较，在阐述“文化心理”概念的基础上，梳理了“五缘文化心理”的基本要素，基本特征，形成原因，并探讨“五缘文化心理场基本结构及效应”发生的机制，以推进对五缘文化心理源问题的研究。

第三册《五缘民俗学》(郑土有)，以文化上的“缘”、“俗”之辩为契入点，探讨了五缘文化之“因缘生俗”、“由俗显缘”及“藉俗固缘”的民俗生态系统，力图建构一个五缘民俗学的体系框架。

第四册《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研究》(赵红英、宁一)立足历史和现实，对海外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因缘成链，落地成团，从守望相助、支撑发展，到争取平权、共同发展，再到融入主流、开放发展的过程及其功能变化特点，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角度进行探索，力图展示多如繁星的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众生态。

第五册《五缘文化：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施忠连)着重论述缘分观念的形成、演变及其哲学意义，揭示五缘文化人文主义精神价值和社会意义所造成的各种生态特征和功能，在此基础上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上，展示它们所发挥的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作用。作者强调作为大众文化的五缘文化民族软实力，其所显示的不同于西方概念的软实力，是中华文化独有优势所在，并且提出发展五缘文化应当成为中华复兴的民族战略。



各册作者从不同学科的角度介入,用不同的视野考量,内容各有侧重,但相辅相成,形成有机整体的学理构架。这是《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预设的本意,能否实现有待于读者的检验。

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应对环境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因此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民族无论大小,各有其特色和长处,没有优、劣之分。在当今“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各民族间的距离拉近了,交流频率提高了,彼此的依赖度更强了,异文化的交流、碰撞、学习、吸收、融合的机会更多了。现在中国正在崛起,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梦,因此民族主体要自觉,理论要自觉,文化也要自觉。我们既要摆脱百年来由于特殊的际遇而形成对西方文化体系的依傍,也绝不能妄自尊大、惟我独尊,重蹈西方霸权文化的老路,应该秉承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十六字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发展共赢,共圆世界梦。

《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的编纂是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自1995年成立以来又一项重大集体项目,课题研究和丛书出版得到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及新加坡郑添文、许婉华夫妇和上海兰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盛晓萍、罗文耀伉俪的资助,同济大学出版社也给予很大支持,罗义俊教授带病参加了丛书的总审工作,责编季慧博士也付出了很多辛劳,此外还得到诸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林其饒

2013年8月于上海



目 录

总序

导言 (1)

第一节 五缘民俗学的提出 (2)

第二节 五缘民俗学的学理依据 (5)

第三节 互为互生：“缘”、“俗”之关系 (8)

第四节 五缘民俗学的定位与基本框架 (21)

第一章 亲缘民俗 (25)

第一节 亲缘民俗的内涵与特征 (25)

第二节 亲缘民俗的表现形态 (40)

第三节 亲缘民俗的功能 (67)

第二章 地缘民俗 (73)

第一节 地缘民俗的发生与基本内涵 (73)

第二节 地缘民俗的表现形态 (81)

第三节 地缘民俗的功能 (94)

第三章 神缘民俗 (105)

第一节 神缘民俗的内涵与特征 (105)

第二节 神缘民俗的表现形态 (109)

第三节 神缘民俗的结构与现代功能 (131)

第四章 业缘民俗 (135)

第一节 业缘民俗的内涵与特征 (135)

第二节 业缘民俗的表现形态 (150)

第三节 业缘民俗的功能 (164)



第五章 物缘民俗	(172)
第一节 物缘民俗的界定及基本内涵	(172)
第二节 物缘民俗的表现形态	(179)
第三节 物缘民俗的功能	(194)
结语:五缘民俗学的展望	(205)
主要参考文献	(210)
后记	(213)



导 言

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为核心的五缘文化自1989年4月由林其铨教授首次提出后,经过二十多年的丰富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架构,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为一个新开拓的研究领域,之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被学术界、政界、企业界所认可,主要取决于其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当代价值和独特的学术品性。



任何一门学科,如果与社会脱节,不关心民生问题,那么这门学科终究是要被边缘化乃至最后消亡的。而五缘文化正是一门与社会民生紧密结合的学问。它可运用于企业管理、发展经济;可运用于国际事务,处理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可运用于民族工作,广泛团结各民族民众;也可运用于社区工作,处理各种人际矛盾纠纷……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末五缘文化的提出就是应当时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通过“五缘”的纽带,团结海外华侨华人,鼓励华侨华人到祖国投资。五缘文化提出以后,在密切海峡两岸关系,加强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两岸经贸关系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弘扬和提倡五缘文化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农耕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转变的转型期,人际关系也正经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过渡阶段,在这过程中,种种社会弊端不断暴露,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人们的道德水准下降等。而这并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也不符合人的本性,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因此迫切需要“纠偏”,回归到人性应有的正常轨道上来。当然,纠偏的工具不可能是高科技,更不是宇宙飞船,而是文化。所以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运用文化的软实力来匡正缺失的文化。而自发产生于我国传统社会的五缘文化正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优势,例如通过倡导亲缘文化,可以强化亲情关系,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倡导神缘文化,可以扬善抑恶、匡正人们的道德缺失,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倡导地缘文化,可以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构建和谐的社区文化。如果从每个个体到家庭、到社区都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那么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就会有较大的提升。从“缘”文化这一源自中国本土、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入手,运用于今天的现实生活,无疑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

五缘文化独特的学术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五缘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性文化。中国人是最讲究“缘”的民族,“缘”的观念深入人心。“缘”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情感认同的标识。可以说讲究“缘”,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是中华民族能够发展到今天的首要原因。即使在海外,中国人所到之处,常常会出现相应的华人组织,会建造唐人街、中华街,会建造关帝庙、妈祖庙,这在世界其他民族中是很少见的。“缘”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方面,亲属之缘,乡里之缘,同事之缘,同行之缘,朋友之缘……通过“缘”建立起了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扎实基础。“缘”文化贯穿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之中,具象化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通过对“缘”文化的深入研究,既可以探索总结中国文化的独特特征和发展规律,同时也可以避免盲目套用外国理论而产生的研究隔膜,从而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

第二,五缘文化具有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理论品性,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因为“缘”文化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民族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诸多学科发生关联。一方面,可以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视角深化五缘文化的研究,例如从人类情感交流的需求探讨缘文化产生的根源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缘文化产生的心理机制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五缘文化的社会功能问题等;另一方面,每种学科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获得启迪,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视域,甚至衍生出新的交叉学科,如五缘社会学、五缘心理学等。本书所要探讨的五缘民俗学,即从五缘文化与民俗的关系问题入手,尝试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从而深化五缘文化的研究、推进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本土化进程。

第一节 五缘民俗学的提出

为什么要提出五缘民俗学?最直接的考虑是从一个新的视角解答以下两个学术问题:一是从五缘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探讨“缘”是如何生成“缘”文化的,缘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以何种形式呈现的,其功能又是如何实现的,以深化五缘文化的研究;二是从民俗学研究的角度而言,尝试从中国本土出发,建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理论框架,尤其是探讨在中国语境中民俗事象是如何发生、传承的问题。

在五缘文化研究中,常常将从“缘”到“缘”文化的发展当作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误将可能性视为必然性。事实上,“缘”与“缘”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林其铨、吕良弼主编的《五缘文化概论》中的观点,五缘文化是指由亲缘、地缘、神缘、





业缘、物缘构成的一种文化,五缘是指依据五种纽带(血缘亲属,郡望籍贯,宗教信仰,职业专业,物)而形成的人际关系。^① 也就是说,“缘”是由于某种纽带而使人与人之间产生某种关系,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例如,两个从事木工活的人,具备了业缘的关系;父母生养了子女,具备了亲缘关系。“缘”的发生有的是先天的,无选择性的,如血缘关系;大量的的是后天的,也即人在求生存过程中的一种选择,如从事某项职业、信仰某位神灵等。当然,这种选择对于一个个体来说,“自主性”往往是比较低的,如农民的儿子绝大多数还是农民、子女很少搬出父母辈居住的村落等。“缘”的发生,为“缘”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但并非必然。如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自然的、生理意义上的亲缘关系,虽然这种亲缘关系从生理的 DNA 来说是永远存在的,却不一定能产生亲缘文化,如母亲生下儿子后,儿子就被人抱走了,从此永不见面,那么这对母子之间就不可能出现亲缘文化。也就是说,从“缘”到“缘”文化的形成,中间是需要种种“条件”的,或者说需要某种“方式”才能实现。就如 A 和 B 两地铺设了铁轨,需要火车来回运行才能将两地连接起来,密切两地人的关系;没有铁轨火车开不了,没有火车铁轨就要废弃。“缘”就是铁轨,什么是“火车”呢?这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否则很难把握五缘文化形成的过程及呈现形态。

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表现来看,当人与人之间由于某种纽带建立起关系之后,首先必然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交往。如果没有周而复始的交往,这种关系也就会在无形之中逐渐淡化消失,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就形成不了地缘文化,即便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交往,其表现出的行为方式,通常都可以归之于民俗。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萨姆纳所说,人总在活动,为了满足需要,达到目标,人总得采取一定的行为方式,“一定的行为方式受到青睐,原因在于它们是合宜的。比起其他方式来,它们能更好地达到目的,或者能少费辛劳和痛苦。在人们追求进步的奋斗过程中,习惯、日常活动程式和技艺就逐步发展起来了”。而人类是群居的动物,“生存斗争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团体的事。每个人都受惠于其他人的经验;因而大家都趋向于被证明为合宜的行为方式。终至大家都采取达到同一目的同一方式;这样,活动方式就转化成了风俗,成了集体现象”。^② 以地缘关系为例,生活于同一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生活、生产过程

① 林其铎、吕良弼:《五缘文化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56 页。

② William Graham Sumner, *Folkways: A Study of Sociological Importance of Usages, Manners, Customs, Mores, and Morals*, The Athenaeum Press, Ginn and Company, 1906. 见该书第一节。转引自高丙中:《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59 页。





中,会自发地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不成文的规矩,以保证人们的和谐相处;遇到困难时,互相帮助;节日中,互赠礼品,共同参与举办各种文娱活动;众人出资,兴办公共设施,如戏台、油坊、凉亭等;也会有共同的信仰活动,有固定的庙会等。所有这些就构成了一种地缘文化。其实在《五缘文化概论》中早已指出:“五缘文化的主要载体,首先是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这五根纽带自然形成的社会群体,而后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五缘性社会团体。当然,在五缘社群和社团的基础上,还会派生出诸多的行为性、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形态,例如亲缘文化中的祭祖、祖墓、祠堂、族谱、宗亲会馆建筑;地缘文化中的乡亲联谊活动、同乡会馆建筑、管理体制、地方志;神缘文化中迎神赛会活动、寺庙文化。”^①也就是说,促使“缘”向“缘”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各种各样的民俗活动。这是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之一。

民俗英文名为 folklore,由英国古物学家威廉·约翰·汤姆斯(William John Thoms,1803—1885)于1846年首先提出,将撒克逊语 folk 和 lore 组合而成,folk 原意指民间、民众,lore 原意指知识、智慧,folklore 即为民间的知识和智慧。汤姆斯对 folklore 界定的内容包括:风俗、习惯、仪典、迷信、歌谣、寓言等。1878年英国民俗学会成立,标志着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民俗学的正式成立。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产生于20世纪初,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受西方民俗学和日本民俗学影响而产生的。其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均来自西方。作为一门世界通行的学科,固然应该有一套规范的理论 and 学术术语。但由于民俗学是一门研究人们日常生活的学问,民俗的产生应落实到具体生活场景中的人身上。民俗是人们在长期的生存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处理日常生活中各种关系(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个体与个体)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式。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和地区,因为生存环境的不同,均会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有“一国之民俗学”的说法。我国古人也很早就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如《汉书·地理志》中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民间也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因此,经过了近百年的学术积累,学界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研究中国民俗应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发出我们的声音,许多学者已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五缘文化提出后,给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迪。从中国人的“缘”入手,探讨民俗的形成、发生、传承、功能诸问题,可以更加贴近中国本土的实际,或许能从中提炼出真

^① 林其铨、吕良弼:《五缘文化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0页。



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话语、民俗学问题。这是本书所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节 五缘民俗学的学理依据

五缘文化与民俗学表面上看似是两门不同的学问,两者学科定位、切入点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不同,但在“民俗”的层面上两者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民俗生活是两者共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如:“亲缘文化”中要涉及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宗族家庭民俗(称谓、祭祖活动、族规家风、孝俗)、人生礼俗(生育、成年礼、婚嫁、祝寿、丧葬)、人际交往习俗等。“地缘文化”中要涉及社区地域的物质生产民俗(生产方式、土特产)、物质生活民俗(饮食、服饰、居住、交通、集市贸易、节日)、村落民俗、地方风物传说、地方戏曲等。“神缘文化”中要涉及民俗信仰的各个方面,如巫术与禁忌、自然崇拜、神灵信仰等。“业缘文化”中要涉及行业组织习俗、行规、工匠习俗、同业会馆公所、行会商会、行业神信仰等。“物缘文化”中要涉及物质民俗的各个领域,如酿酒技艺与饮酒习俗、制茶技艺与茶俗、民俗食品(如元宵、月饼、青团、粽子、重阳糕、饺子)、庙会与集市、民俗工艺、民俗用品、民间美术(如年画、灶壁画)等。究其根本,主要是缘于以下四方面原因:

(1) 五缘文化和民俗学的着眼点都是社会中的“人”,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维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为生活服务。而人是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过程中的产物。费尔巴哈说:“当人刚刚脱离自然界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①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性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大,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但同时每个人又都被文化所塑造。英国著名进化论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中最早提出了文化的概念:“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②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1934)中指出:“(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一种使这民族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的方式。”一般认为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文明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技术系统)、精神文化(意识形态)、制度文化(社会系统)。文化分层理论通常将其分为: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

① 转引自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

②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化。如果以一个族群或民族为单位,撇开社会阶层,那么又可分为:有文字记载的典籍文化、没有文字记载的民俗文化。人所创造的文化首先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口耳相传的民俗文化,这种文化在文字普及的时代仍然通行并不断创造。

对每个个体而言,塑造人的首先是民俗文化。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个体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造物了。待孩子长大成人,能参与各种活动时,该社会的习惯就成了他的习惯,该社会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该社会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每一个孩子,一旦呱呱落地就生活在他拥有相同习俗的人群中,任何一个出生在东半球的孩子不可能一生下来就获得与西半球的人同样的习俗,哪怕这种雷同只达到千分之一的程度。”^①人从一生下来所接受的就是长辈的民俗文化教育。人一生中,除了接受学校的书本教育获得知识外,更多的是在生活中默会的民俗文化知识。人成长的过程也是不断俗化的过程。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文化存在机制,其核心基础就是民俗文化。一个人可能不识字、不掌握典籍文化,但不可能没有民俗文化。每个人都是民俗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民俗文化的承载者。因此,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民俗生活中的人,以及每个人是如何遵循业已形成的民俗规则处理各种关系的;而五缘文化中的“关系”,说到底也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2) 无论是五缘文化还是民俗学,都关注一个社区或群体的文化“传统”,而“传统”是长期以来在实践层面逐渐形成的,以民俗生活的方式呈现。就功能而言,民俗是人们生活的导师,指导人们处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大小问题,大至人与自然的关系,小至每个人的吃饭穿衣。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个体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经历人生的诸多“第一次”,如结婚、生子、丧葬等,毫无经验可言,常常会手足无措;但个体的“第一次”对于群体来说已是“N”次,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群体中的历代先辈们已经形成了通行的处理方式(民俗),如婚礼该如何办、祭祖时的祭品需要哪些等,个体只要遵循群体中业已形成的程式化的处理方式,就可以将貌似复杂的问题迎刃而解。当然,这些外在生活方式背后的是内在的心意观念,如审美观、价值观、善恶观等。这种代代相传的、群体惯行的做法和观念,就是传统。

^①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张燕,傅铿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